

對於鋼院此次整風的兩點建議

耿步蟾

1. 編印介紹鋼院教職員工的名冊，使同志們互相認識，便於團結，減少矛盾

我們知道，我院此次整風，是要克服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要達到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目的不外乎要大家能團結一致，做好我們的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更好地幫助我們偉大的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得以順利的進行。但就團結來說，須要有個進行過程，首先要使我們同人們彼此認識，彼此了解，再經過從團結願望上出發，做到批評自我批評，達到在新的基礎上的真正團結。

我深知道，在舊社會中，凡是一個高等學校，差不多都有一個教職員工名冊，有的還載有歷年畢業生的姓名，每年刊印一次，目的就是為了介紹於校內，使校中同人彼此容易聯繫，並公諸於校外，使社會上知道本校的實際情況。我們鋼院自建校以來，轉瞬即達五載，沒有這個刊物的出現，以致同人等共事數年，還有多人常常見面，頻頻點頭以至交談，而對姓名是什麼，職務是什麼，尚屬茫然，因為是會面很多並認識很久的人，當然不便詢問其貴姓大名了，就難免彼此間發生一種很不自然的感想，因此，我以為刊印此種刊物，實是當前的一個要圖。也是加強團結，加強聯繫群眾，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幫助。

我還建議，我們鋼院除了編印這個職工教員名冊以外，還應當計劃編一個全面介紹學校內容的刊物，對於經費問題，除了贈送品之外還可以作為售品，託新華書社出售，收些印刷補助費。

2. 改變自舊社會帶來的壞習慣與壞思想，徹底革新，以端正我們鋼鐵學院的校風。

我建議，我們鋼院同人，包括教職員工和同學們在內，在目前的新社會里，都應當遵照我們中央最高領導毛主席的指示，重視道德品質，重視業務和技術的學習，去掉舊社會里的一切壞習慣和壞思想，改正我們的校風。古語：“除舊滌俗，咸與維新”，我以為我們都是從舊社會來的，都難免多多少少帶有些舊社會的不良習俗，今日在新社會里，固然覺得非

常榮幸快慰，但除惡必須務盡，從此改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學校中，應當積極地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積極地做好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不應當專為個人利益而積極於求名，積極於求利，積極於求往上爬，甚至忽視道德品質，這種行為，引起利害關係的矛盾。

近在人民日報上（5月31日第二版）看到民主人士張雲川的發言，內中有，“只相信少數的人，把他們當做積極分子，依靠他們的信口雌黃，就把誰進步誰落後排了隊，使黨和群眾隔離開來”，我對這幾句話，頗有同情的感想，以為這也是產生矛盾的一個原因，此種事實，若存在於學校中，其為害實不在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主觀主義之下。我們鋼院，對於這個應當檢查一下，倘若有之，必須除之；若是沒有，也應當戒之。

再，我以為，我們鋼鐵學院，是一個教學和科學研究的機構。古語：“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就是說：要立志研究學術（道），須先要有高尚的品質，又要參加學習工藝，須先要有仁愛的思想，否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廣泛的說，比如原子爆炸、氫彈試驗，無補於和平共處，而反有害於人類的安全。因此，我体会到，我們高教部對於高等學校除了經常的指示改進教學工作以外，還不斷的有重視政治思想教育的指示，其意義的深遠，實堪欽敬。

最後，我發表以上言論，因為以往我在山西大學任教，前後近三十年，同時，並任過行政職務一個時期，曾親歷過不少的類似事實，因而也具有相當的經驗。所以我的敘述，大半是本著拿往事以側將來的意義，現在又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指示，與治病救人”的方針。古語有：“過則勿憚改，就是說“人非聖賢，誰能無過”，有了過不要怕改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我建議，我們鋼鐵學院同人，連我自己在內，效法古人的“吾日三省吾身”，從此自行檢查一下，當然除違法亂紀者外，對於一般過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並幫助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使我們鋼院的整風運動，達到勝利的完成。

從今天想到明天

政治教研組 黃達三

從本院最近舉行的一系列的座談會和自由論壇中，以及從校刊、工會通訊、黑板報和大字報中，揭發了不少本院內部矛盾的事實。儘管部分意見有些偏激，但總的說來，這些意見對整風運動、增進人民內部團結和办好學校都是有幫助的。我從今天所揭發的矛盾中，想到本院明天應作的一些事，現在簡略地提出供同志們參考。本院明天應作的事是很多的，我不想多談，現在只談我認為最重要的兩點：

（一）要把學校內兩個集體建立起來

蘇聯傑出的教育家馬卡連柯說過：要办好一個學校，必須建立兩個好的集體。一個是學生集體，一個是教師集體。

我不能把這兩個集體要達到怎樣的標準作詳盡的描繪，因為各個好的集體都會在不同的條件下形成，就自然會有各式各樣的內容和形式。不過作為舉例，也可把我所想象的集體輪廓大致舉出來。學生集體可以朝這樣的方向發展：首先使學生們生活在一個有組織的統一体中，無論在學習、工作或生活方面都有一定的目標和紀律。這些目標和紀律要由學生在黨、團和教師的協助下自動養成，成為風氣，並以傳統的形式在學校內鞏固起來。有了這種好的傳統風氣，就成了學校內一種積極的強有力的教育力量。只要目標和紀律正確，而又是由學生自動自覺建立起來的，學生們生活在這樣的集體中必然會活潑愉快，又能嚴格要求自己。在這樣的集體下，不僅學生們一些消極不好的傾向或行為可以消除或減少，而共產主義的品質也可以逐漸形成。健全的集體生活才是

最好的政治思想教育。

教師集體（包括職員）要有一種這樣的共同理想和行動：在一個使學校不斷發展的共同目標下，彼此合作，研究學術，教育青年。要使每一個教師都樂意把办好這學校作為他的終身事業。要使學校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可以引起每個教師的自豪感。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就必須使教師們對學校的各項工作都有發言或參與的機會。這樣他們可以親切地感覺自己在學校內不是一個被僱傭者，而是主人，在這兩個集體形成的過程中，首先要形成教師集體。有了好的教師集體才能形成好的學生集體。

回頭看我們的學校怎樣呢？學生和教師雖各有自己的組織，但是我所說的那種嚴格意義的集體是沒有的。我認為有很大一部分的內部矛盾和製造矛盾的三種主義都是因為沒有這樣的集體而產生的。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了兩種好的集體，學校內部的矛盾和三種主義一定可以減少。在今天這樣好的政治社會條件下，有強有力的黨團組織，經費也相當充裕，同時新办的學校沒有任何習慣的拖累，要建立好的集體應該是比較方便的。

我把這樣的問題提出來，不是唱唱高調，逞快一時，而是認為一個社會主義的高等學校，應該擔負起它自己的莊嚴任務。

當然，要在學校中形成這樣兩個好的集體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要經過一系列的艱苦鬥爭。不過一定要有建立集體這一明確的方針，才能把全部工作在這方針下統一起來，才能把人們的積極性在這方針下發揮出來。

办好一個高等學校，努力的目标是多方面

的。有學校建築和設備的目標，有教學質量和學術研究提高的目標等等。不過，形成兩個好的集體是各項目標中的中心環節。如果兩種好的集體沒有形成，就是解決了一些其他的問題，也不會取得很大的效果。如果有了好的集體，也就容易解決其他的問題。

（二）要把學校內的制度建立起來

從最近揭發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沒有制度或者沒有嚴密的制度造成的。因為沒有嚴密的制度，就助長了三種主義的滋長。例如人事任用問題、評級評薪問題、系和教研組秘書專權問題、補助金分配不公平問題等等，都是因為沒有嚴密的制度造成的。如有嚴密的制度，任何問題都可以攤開來評論，人們可以依規定要求，掌管者也可以依規定拒絕。爭論的幅度就一定要小些，偏差自然也一定要小些。我們不能把制度看作萬能，任何制度總有一定的彈性，但是較好的制度不僅對當事者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並且對工作還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可以增加工作效率。

好的制度也是好的集體的組成部分。好的制度可以幫助好的集體的 formed 和鞏固。

所以有定備的制度不僅可以減少內部矛盾的產生，同時還可以促使學校發展。

一個學校除必須具有一定的物質前提，如建築、設備、師資等項以外，還必須有好的制度，好的教師和學生的集體傳統，才可以說上了軌道。

另外還必須強調一點：無論建立集體或建立制度都必須依靠群眾，充分發揚民主。只有群眾自己建立起來的制度，才是他們擁護的適合的制度。

一個學校如果具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又能把好的計劃工作和組織工作配合起來，前進的步伐不會太慢的。

也談談“鳴”和“放”

俄文教研組 又鳴

到目前為止，俄文教研組已經開過五次大會了。在每次會上都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少意見，把過去長期積壓下來的矛盾談出來了。這是有助於整風和解決我組內部矛盾的。

但是從已開過的幾次會議來看，不能說情況是完全正常的。至少我個人認為某些同志對“鳴”和“放”理解得不够全面。例如在一次會上，有一位同志就“拍馬屁”和“不說良心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當時就有人認為這是壓制“鳴”“放”，要主席制止他的發言。而當主席允許他繼續發言時，就提出要求撤換主席。（當時會場的確亂了一下，有不少同志要求讓那位同志繼續發言，不同的意見可以在他講完後再提）。又如在另一次會議上，一位同志向組內的一位黨員提了不少意見，說她的健康、名譽，甚至俄語教學效果的好壞都要這位黨員負責。這些意見是否正確這裡不談，她提出這些意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當另一位教員起來發表不同的意見時，她就認為壓制她“鳴”“放”，不願再參加開會了。結果下一次會議就沒有來。再如最近的一次會議，有幾位同志沒有來，據說不來的原因是教研組壓制“鳴”“放”，解決不了問題等等。在會議中途，因為有人起來發表不同的看法，而有人中途退會了，認為會議無法開下去。

我個人認為“百家爭鳴”就是每個人都有發言權。可以發表相同的見解，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對某些事實的解釋，甚至對証也是完全可以的。所謂“鳴”和“放”往往是一回事，不能把它們截然分開來。一家報紙關於“鳴”“放”的解釋說得好，現摘錄如下：“各抒己見是放，你鳴是放，他鳴也是放，你同意他發表的意見是放，他不同意你的意見，而發表自己的意見也是放，對已揭發的問題加以具體分析是放，研究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措施和意見也是放……”因此，那位同志提出要撤換會議主席，也不失為放的一種形式，無可非議。但如果認為說出不同的意見，就是壓制“鳴”和“放”，就未免太偏面些了，不參加開會和退會不是解決問題的办法，我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坐下來平心靜氣的談，真理愈辯愈明，是非曲直到頭自然會明白。

大家討論對肅反估價問題

我想…… 机57.2 李魁銘

肅反在机五九.一

——為肅反問題討論而寫

机59.1 23人

如果希望為恐懼制約，好體面為愛生命所制約，貪圖快樂為關心健康所制約，你就既看不到放蕩的人，也看不到冒失鬼，也看不到懦夫了。

——狄德羅：“哲學思想錄”

承認吧，無論是失慎，錯誤，痛楚的經驗和由于自信而造成的過失。如果承認錯誤的決心也為愛好體面所制約，真正的威信就沒有了。在肅反中我深深感到人的尊嚴的壓抑，感到理性被怪異所歪曲。原是很明白的事，我們看不見了；原是很單純的事，我們看複雜了。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象藤一樣纏繞在我們身上。我們把朋友看成敵人，把世上本不能消滅的矛盾看成異端，我們听信沖動和盲疑的支配，我們甚至也不能相信自己。

我經歷了極為痛苦的日子，我不敢回憶那些日子。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正如康定藏族的一首民歌說的：“幸福別人有，可是我買不來；痛苦我很多，可是賣不出去”。但終究相信黨的光輝和它的真理，我經受折磨而未消沉，一個共青團員的意志支使我面對明天。

朋友，你有過這樣的厄運嗎？在你熱情的探索知識的道路上，在你企圖突破自己和環境的偏見的努力中，你一方面獲得了什麼，一方面又失落了什麼，這本無可非議，因為世上本無純然的獲得，不失錯的只有不前進的人。但當你失錯了一步時，你忽然被粗暴地否定，被歪曲，連同你獲得的東西也蒙上神秘的色彩。有一天早上起來，你忽然不認識自己了。你必須承受侮辱，再用自己的嘴侮辱自己，用這支誠實的筆為自己製造你也不敢相信的供詞。你忽然失去了人的一切權利。你忽然失去了友誼、希望、幻想，忽然坐在冰窖中……

過去的都過去了，我健康的活着，思維着，“桃花依旧笑春風”。那事，“是如春夢了無痕”麼？沒。心灵的創傷，常常隱隱作痛，那瘡癤象蛇一樣爬滿全身，那恐怖象囚一樣俘虜了我魚一樣活躍的心。你們能理解我麼？一個人，在他十九歲那年，正是含苞欲放的時候，忍受了一場致命的暴雨，在養傷呢！

那麼當我們反過來回顧發生過的一切的時候，我們能看見什麼呢？請把那摧殘了人的靈魂，人的精力，人的朝氣，人的有益的自尊心的一切估計進去吧，請把那摧殘了人與人之間純真的關係，使人冷漠的一切加到百分數中去吧。請把多少新鮮思想的萌芽（常常是帶着某些錯誤的）的折斷，放到高談闊論中去吧。

我沒有喪失信心，對這個社會和它的倫理我有大的愛，我反對那些離開社會主義言行。但，衛道者又與社會主義有什麼相干呢？掩飾缺點與布爾什維克又有什麼相干呢？見仁見智，辛酸也好，荒唐也好。

為辦學進一言

數學教研組 潘文熙

我院整風以來，官僚宗派形式式的揭發雖多，但卻看到“三少”，一是黨表示態度少，支持群眾少；二是辦學根本問題被人注意很少。我聞知黨是有嚴明紀律的，也有一切為了廣大人民利益與任何時候貫徹路線的高度原則性，但面對今天已揭發群眾所憎恨的壞人壞事，却有“但聞眾聲喧，不見黨出來”的感覺。即使黨提出一些事件的處理，但我以為應該比群眾是更有組織和覺悟更高的，那末在黨內說，這些壞人壞事就應當受到比群眾更嚴格的指責和嚴肅的處分，黨就應當比群眾感情上更憎恨那些壞群之風，並堅決地支持發揚那些正確的東西，打倒邪風，從而領導群眾前進。但今天領導們是否對待這些是感情上痛惡它呢，還是另一種心情呢？對於受欺壓和被瞧不起的人的鳴不平，甚至是義憤填胸的申訴，難道也是領導們簡單地可理解嗎？現在我想主要談下面一些問題，就是今後怎樣辦學問題就自己的見解和信念願進一言。

知識份子是人文化的教育者，及文化科學的繼承者和傳遞者。從他接受一定的知識起（在高等學校知識份子說，是專門知識）他終生的勞動就與此不可分。在今天，知識份子就是以其一生的勞動為社會主義服務，絕無另外的道路。因此他最需要的是人民的信任，使知識能夠更好的貢獻給廣大人民。知識份子也是無產者，但是我們不明白為什麼今天高等學校里還儼然分成知識份子與黨政人員兩類人，也不明白為什麼知識份子即使入了黨，似乎因有了

肅反運動的重新估價，對黨委會是一針見血而又不可驟閃的具體問題。黨委會必須立刻表示態度！

我班的肅反情況，經昨天「翻案」後，一致承認錯誤是主要的，而由這種錯誤所產生的效果是惡劣的。現將會上發言整理如下：

一、肅反之初

當各系都在轟轟烈烈地開展肅反運動時，機械系因較為沉靜而落人之後。但因理論上說：“反革命份子，百分之九總會有”。於是某些黨員急不可待地尋覓對象，捕捉典型。我某班黨員在熟悉某同學有落後言論和家庭牽扯後，立即將他視為鬥爭對象，一方面向上匯報情況，另一方面進行動員工作，發動同學檢舉。

二、準備階段

某黨員首先發動與該「典型」同宿舍的有同學搜集材料，夜間到別齋去寫。接着召集秘密會議，一再以“划清敵我界限”“站穩立場”之類的話，激起大家的“對敵鬥爭情緒”。這時，有些同學明知這是思想問題也只好“分清界限”“站穩立場”，而有人則以為真的跟老虎住在一起。於是，肅反的群眾基礎就此形成了。

某月某日某黨員召開班幹部秘密會議，宣佈明天鬥爭某同學，並決定對之進行監視，以防逃跑或圖謀不軌（因該同學確曾有一把刀子）。

鬥爭那天早上，黨支部組織召開秘密會議，班上十多位同學被通知參加，會上佈置如何激烈地發言，如何點燃群眾怒火，並且供給材料分頭準備。而這時的另一個地方，被派去監視的同學却正在和他有聲有色地大談古典文學呢。

三、鬥爭會上

黨支部組織5個班參加鬥爭會。首先支部指示這是「批判反動思想」這是「幫助他認識錯誤」「對事不對人」等，但這些話全是無氣無力的。佈置鬥爭的事實和鬥爭會上的土改氣氛和聲勢，證明那決不是批判思想，也不是“治病”，更不是“救人”。人們沒有忘記會上的哭喊吶喊，拍案……

那是嚴重的侵犯人權，摧毀人的靈魂；那是造成肅反後不少人自覺地埋葬自己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的第一槍。

四、肅反以後

後來對該同學沒有作出什麼結論，事情就過去了，同學們的關係，並不見得有轉好，有些人默默的生活着，有些人因鬥錯人感到內心的負疚。一切如常，笑聲依舊，然其種類却何其多也！

學者的頭腦終是不可靠。這一規律註定了不被信任，故仍如同外人。老實說，學校是知識份子養生立命的大家庭，其愛護本是超過任何人的，知識份子自己辦學也是天經地義的事。當然知識份子一樣有黨內的黨外的成員，這與“黨的領導”毫無抵觸。但解放後這種辦學的基礎却似主客顛倒，這是一。其次，不論誰主誰客都好，解放後高等學校儘管大力提倡什麼，都恰巧缺少一樣東西，就是“學術領導”。這與知識份子作客處境是變生子。在這種情況下，教授不被信任、黨員專權、秘書听政、編制臃腫、真材實學變為冷門、教師評定級別混淆無標準等等，一切都來了，總之，糟得很！不象辦大學。試問外國大學與學術機構（包括蘇聯等國）那處不是教授學者們主持領導的？唯我國獨無，我國學者本來不多，加之不信任，就愈發埋沒其作用了。談到“信任”，絲毫不是指生活要特殊化，坐小汽車，住洋房等一切不必要的做作。是學術上，辦學上他們真正地成為“主人”，與此同時，應該多方面提倡學術，是有百利而無害的。目前象我院那樣學風稀薄，難怪已離院的劉教授曾說：“我死也不留在鋼院教書”，學術的受到打擊可見，真是做到“殺”一做百。講師與助教升級問題也是，大的象那些仗勢欺人，象直升飛機那樣飛黃騰達上去的姑不論，就是“近水樓台”借歌功頌德，“團結在周圍”的人獲益非淺者和冒牌者，難道又少嗎？一般教師評級如何評定，離開了教師的學術水平與工作成績還能空談什麼？過去提升講師太易，似乎滿若干年就必提升（糟的則既不滿年限連課也不能開的也硬拉上，美其名曰“培養”了這些人），我認為很

有問題，從來沒有聽說過大學里因為某人僅僅能開課就授予講師的名譽，教授更不用說。外國教授的被聘是說：“由於你的某種研究工作，聘請來本校研究並任教……”。教授的高尚學銜的授予也是根據這。即使我國也曾頒佈教師職責，其中教授、講師各有十項，未聞離開學術水平與獨立研究能力而談學術職責的。不然又為什麼大學要分學銜而中學就一律稱教師呢？故能講課，僅僅具備了講師職責的起碼條件，但另當別文有了規定，但對某些人既不嚴，而當另一些老講師提升時，當事者就巧妙利用這些法寶呀！目前，怎樣人升講師，竟有黑市行情，那種做法的副作用可真大。所謂，“按勞取酬”的工資評定，恰如其份說已成為“按歷史資格取酬”，或「按官階加上“黨性”取酬」，所謂“評得基本正確”，真如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在學術風氣稀薄的环境里，有學識的人就要窒息，“冒牌”的可以混水摸魚。領導者看“教授”不是看他們的學術活動和教學勞動，而是只辨認這人是主任或是個領導，某人則不是。認為教授當上一領導是“升”為主任，或什麼長，甚而公開認為“主任”是教授奮鬥的目標。真是教授們的恥辱！這是官風，不是學風。教授奮鬥的目標應該是培養下一代和取得科學成就。在這種庸庸的觀點下，教師隊伍良莠不齊，在賞罰不明之下，不學無術者大佔上風，有識之士能不“退讓”嗎？我認為應該提倡對教師尊重信任與嚴格要求相結合。我主張鼓勵學術自由競爭，包括教學好壞的競賽，這是對社會主義有益的競賽。人的才智能力本來就不同，不能壓個齊平，只求立足點平等。同時可以建立種種考試制度，留學生要考，留優等生要考，升等級要考，這不是什麼奇怪事，蘇聯院士的授予就是通过比考試更嚴的評定的，如學術答辯種種，教授也無例外，在“學術治校”的原則下，可成立學術委員會，審理學銜升降等級重大問題，並鑑定教師科學與教學工作成績，別的機構無權決定。過去的以不懂學術的人事科長竟有權力可以對教師說“給你某某級”真是污辱至極，學術委員會成員除院長外，由學術水平較高的學者教授參加，但也有講、助階層代表，不懂業務者恕不必參加，上層建築如此。各下層階層可以成立有講、助、職、工友代表參加的校委會，但學術研究與學術等級重大問題，仍以學術委員會處理較好，黨委的設置與此並不抵觸，比如掌握行政思想作風的領導與檢查等，是否可以起象“監察委員會”這樣一類的作用。當然，可能的話，我們是盼望領導學校上下、黨內外的都是知識份子。提倡學風還不止此，如開辟園地，多報導教師的科學活動與進修情況，介紹學校中每個教師的專長。本院非冶金專業教師也要了解其科學方向，其個人科學方向也值得介紹，過去不重視普通及基礎教研組已是眾人皆知，一個有多年或幾十年工作的教師的一生，在科學教育上真不知有多少值得說的事，都可交流一下，勿一介紹某人就是“典型”，應平凡而經常化，報紙上也曾介紹勤儉家庭主婦的生活，不也很能勉勵人嗎？還有圖書的掌管，本來教師有能力，可以由系、教研組管，圖書館行政上不懂業務，特別是對待專門什誌與專業書，提意見格格不入，比如專門什誌定訂單應同教研組共同作最後決定，但目前圖書館不知按什麼決定定單，也不公開並且竟然年年更改訂購單，不曉得訂專門什誌是百年大計，不能年年更動，否則不成套，形同廢料。再說一例，我前年有一論文稿刊登於1956年1月號的“數學通訊”上，但由於本校圖書期刊紊亂，至今我未能看到所登自己的文章，諸如此類還很多。再談談工作問題，過去院系調整那種“整”八式的調整，把“才能”與“人性”都一概不顧了，明明原來是某專業的教師一“整”却讓師生分家，理工也分家，進了冶金部系統就如隔天河走不出去。教師供給給學校，彷彿採原料供給機器似的。兩年來我請調工作一拖再拖不處理，說明某些單位科學干部很需這種人材，全國也都缺，對待這些心肝肺腑的話，不置信！介紹適當教師補充，以保證工作，亦不理。在外邊絕非可有可無的人，在鋼院成為可有可無，一個知識份子長期不能發揮他的知識為人民服務，唯一的就郁郁而生，也只能郁郁而死。

最後提兩建議，一是專職的象工會副主席一類高級脫產人員，請儘量少安插，徒增國家負擔。二是各級領導的任用，包括系主任與教研室主任，可否有選舉制，如同人大代表也是幾年一選的，梁棟雖能支撐大廈，日久也會有腐朽的。我的一点点見解就這些，我說明這也是我的“信念”，不免許多從個人所見出發，但如能引起同志關心這一個辦學根本精神的問題——拯救學風問題——也就萬幸了。

仗勢欺人的黨員——趙彥樞

机61.9 李開明

一、我的苦悶

1953年，我被分配到鋼院機械系一年級學習，我的學習可以說是埋頭苦幹的。但在學習中，發現自己對某些課程，如工廠實習，機械制圖學不來，又加上自己有鼻病的限制，就更感困難。例如上電鍍工實習時戴上面罩後保護氣體一來，使得鼻阻塞，鼻腔干的利害，不能通氣、頭昏、站不住。再有機械制圖，立體概念建立不起來，學起來有困難。所以就預料到工廠實習學不來，那麼以後下廠做生產實習受不住高溫刺激(鼻干炎之故)該怎麼辦?而機械制圖學不來，那麼以後課程設計和畢業設計又怎樣做呢?因此感到在原專業無培養前途，但是學習其他的一些專業是完全可以的。因此，有轉學的要求。但當時院領導給同學的壓力是相當大的，不敢提，誰要是大膽提出來，將有很危險的對待。所以這件事一直悶在心裡，長期的壓抑就這樣一天一天的學習(對工廠實習和制圖，用了驚人的超學時，最後考查通過了)一年級第一學期，考查功課全部通過，考試功課共四門，成績為5分、4分、4分、3分。第二學期，考查功課全部通過，考試功課共四門，成績為5分、5分、4分、3分。就這樣，由於緊張的學習，負擔過重，而問題長期的得不到解決，在二年級上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病倒了，不僅鼻病加劇了，而且得了不愉快的神經衰弱。

二、從鋼院到病院

在宿舍里，躺了一個多月，後來醫院通知住院，“體驗生活”一百多天。先做了一個療程的“睡眠療法”，這種療法的特点，是多睡覺，清晨大夫向病人了解吃、睡的情況，和大家一起讀報，然後就是“文娛療法”，大夫、護理人員、病人同唱、同勞作、同運動、處處體貼和安慰病人，親如兄弟。晚上大夫還圍在病人床前徘徊，怕大家睡的不熟。所以很多病友都能將心裡話說出來，告訴敬愛的大夫。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一個療程過去了，後又轉到鼻科，做植骨手術，又是兩個月的時間，所以先後渡過了一百天的病院生活，出院時和大夫們、病友們、難捨難分，以後大夫們又寄信給我，問候我的病情。為什麼我要講這些呢?因為他們的待人和思想作風與趙彥樞秘書的待人和思想作風是一個鮮明的對比。一為治病救人，一為打擊害人。

三、不平等的待遇

對於休學的同学，只好回家。但有的同学可以例外，享受特权，住亞洲學生療養院，坐小汽車，可以留校。我經過實事求是的考慮了大夫的意見，心想如領導上同意，能轉學最好。當時我仍然有顧慮，總是沒有勇氣，不敢向領導秘書說出轉學的要求。以後總算提出了，但是覺得不安，精神上非常痛苦，因為不知道趙秘書怎樣處理這件事。趙先是不同意，後來不得不答應了(這里說明一下，我的要求是合理的，符合高教部的規定：如同学有某種疾病的限制，不宜在原專業學習的，在原專業無培養前途，但是適宜學習其他專業的，應給予轉學到其他院校學習)，所以來信告訴我同意了。

四、拖拉、欺騙、威脅——工作三部曲

我回信請他轉南大物理系，拖了很久才告訴我，說對方學校不接收，事後我發現這完全是欺騙，他對領導上說認為不能同意。這就是欺上瞞下的行為。為了使我的學習能得到適當安排，於是我再要求時，就採用了威脅的手段，在給我的信中說：「要調查我的人事材料，」幸亏我是個清白的學生，不然就會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人一棒子打死。最後竟提出，讓我退學，目的是想使我丟掉學生最寶貴的東西——學籍。同學們！看看！多恨毒！

接到他這樣的來信，終日憂慮，造成精神上很大的刺激，因而夜不能眠。在吓唬威脅之下，只好忍痛的放棄轉學的要求，趕緊要求復學，不然，趙秘書的鬼把戲是相當多的，誰知道又會出什麼新花樣。

五、天津——北京，北京——天津，被迫回家，領導意圖就是命令

早晨登上火車，中午到北京，出豁口，來到鋼院之後找趙秘書談提前復學，他氣勢凶凶回答不行，我再三要求，才請示魏院長，魏院

長說：“學期中間不能復學”，趙彥樞能領會領導意圖。領導意圖就是命令，根據命令所以不行。你如有意見，儘管往上提，態度即粗暴又生硬，絕不是剛才請示魏院長時的神氣了。這個事實表明了趙彥樞的完全虛偽。請問為什麼不行？理由到底在那裡？完了以後時間已很晚，我要求在学校裡住一天都不可以，那我只好當天乘夜車由北京到天津，到家是半夜了。

六、怒髮沖冠，同學受處分

在復學的問題上，系領導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對同學情況不願意了解，也不作具體工作，甚至不講原則和規定，他說怎樣，就怎樣辦事。我本應該在1956年度第二學期復學，編入二年級學習。完全應該繼續隨二年級上課，(因為二上的功課，全部都讀完了，正是因病沒有參加考試，根據高教部規定，病好以後，補考就成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領導却說「沒有老師給你補考」，相反的逼着我讀一年級，理由是：因為教學計劃有變動，理論力學拉了幾章的課。作為一個同學，當然不能接受這種不合理的決定，我三番五次的向領導提出意見和批評，但仍堅持錯誤的決定，對同學的意見絲毫不採納，壓制批評。有一次我又去找趙要求改變決定，趙竟大發脾氣道：警告你，再不從決定，就處分你。我說：你根據什麼這樣決定？你憑什麼處分我？這一下觸怒了趙秘書，果然是言出法隨，不久以我到二年級上課的週數，全部算作曠課，處分終於有生以來第一次降臨我身，並且以行政命令強迫我到一年級去上課。在我到新班之前，就想處分我，但佈告始終不出，早不出，晚不出，單單這個時候佈告出來了，這樣就使你在新班很難搞好同學關係，趙彥樞的投機取巧，做的真漂亮！

七、故意刁難

在趙盛怒下，這是黨員的威風，誰敢不服從，這樣由二下到了下，可是學期大半已過，叫我重新讀了制圖，理力，革命史。學期考試理力得了4分，革命史4分，而制圖原來有成績(根據規定考查功課是可以免修的)。但趙說：“原來的成績不算”(以前制圖是趙教，成績也是他評3分)試問其他幾門功課，成績都算而且免修了，而唯獨制圖成績不算，這合理嗎？

以後因為拉了幾張圖，因作業不全，不准參加考查，過後又說，補考好了。在暑期佈置了很多作業，我因暑期生病，開學後仍未恢復健康，故作業有幾張不全，要求再給些時間畫圖。

八、做學生難

國慶節前夕，系主任竟不准同學參加遊行，在這一兩天時間內，命你一定要把圖趕完，否則，你放棄考查。這真是強與人為難，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事。結果沒辦法，硬趕。但更奇怪的是，最後評定成績一定得由趙彥樞參與，居心何在？看一看下面的就會明白了。

當天晚上考查時說：成績還不能給。我再三的催，回答說：研究研究，最後講：認為不能通過，就這樣結束了制圖考查。

九、知人知面不知心，借刀殺人

學期過去已有8週之多了，過後通知我，“根據新的規定，考查的功課有一門未通過的留級”。當我問趙：為什麼有的同學，不僅是考查的功課有些未通過，甚至考試的功課也有一門或兩門不及格的，照樣升班呢？趙完全否認這件事。我們大家都知道，根據目前大字報揭發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例子很多，如某黨員，兩門功課不及格，仍可升級，什麼是特权，這就是特权。心懷莫測，今已知曉，无非是想借刀殺人。

十、院長辦公室、教務處、系辦公室是統一戰線——壓抑民主

對於同學的向上申訴，許多單位採取全面抗戰，不然就是置之不理、積壓、拖拉。口頭上說受群眾監督，而同學有了不同意見時，就說是“亂提意見”，“鬧事”，“反對領導”，“打擊領導”，就這樣，誰也不願也不敢提意見了。為了向上反映系領導無理的決定，曾寫了報告，對系領導的一些工作提出了意見，希教務處重新處理，但教務處官僚十足，不容

許同學說話，反說：同學胡鬧。無法只得致函院長辦公室，有一位秘書雖然看了，不但不給解決，並說：你對系領導提的意見很不好，是有意打擊領導，回去應好好的檢查檢查思想。當時再要問時，却說“這是高教部命令，院首長指示”來壓倒一切，同學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十一、高教部是個大衙門

高教部比王府還嚴，大門都進不去，無介紹信者不准進去。好不容易才打聽到了，每星期二下午有接待群眾時間，需登記挨個。這樣总算見到部里的人了，令人失望的是不管不問，圓滑的一推了之。

十二、悲慘的遭遇

回校後，使我萬分痛苦，通夜感傷，未能成眠。每日想系領導對我這樣反感，我如何能在鋼院學習下去。由於終日憂慮，造成精神上很大刺激，因而神經衰弱病，又一天天嚴重起來。為了排洩心中的苦悶，就無限制的寫信，整天的讀小說，古今中外，拚命的玩，去公園唱呀！跳呀！失去了最親愛的朋友，悲哀、失望、不會平盡下來的。正因為如此，一連幾個星期沒去上課，後來仔細的想了一想，既然在原專業無培養前途，領導上又特別厭煩你，遭迫害，何苦來呢？干脆不如調個地方，換換環境，無論如何，也比鋼院強，“男兒志在四方，到處為家”，有什麼可留戀的，鋼院使人傷透了心。

所以再一次提出轉學的要求，這次趙竟滿口答應，與上次同樣叫填寫志願。過後說：給你轉了，對方學校不接收，怎麼辦呢？我一氣之下回家了，寒假後回校時，趙彥樞和張致祥兩位秘書，非常氣憤，臉紅脖子粗的严厉的斥責，對我人格侮辱，把門一拉說：你滾出去。我當時也有些激動了說：系領導對同學的態度也太不友好了，不允許任何人對我的的人格侮辱。趙說：應當開除你。張說：叫你退學，已經過寬了。呂主任只好做應聲虫了。

十三、官僚主義害人不得翻身

我向領導：系領導、教務處、院長辦公室、院長大聲疾呼，但無回音。結果同學們起來為我講了話，有的同學給院長寫了信，這樣才算壓了歪風。結果同學們保護了我，那次我差一點被官僚吃掉。可是受傷了——因曠課幾週，給予留校察看一年的處分。

十四、反覆施加壓力，檢討書寫數次仍不如意

處分前系領導開始找我談話，要我很好認識錯誤的“重要性”，根據反省的好壞，再決定我是否繼續留校，看我寫的材料是否深刻。我只好慮造了很多錯誤和缺點，被迫前後共寫檢討書數次，共寫了20多篇，可是還不能使他感到滿意。

十五、剝奪公民權利，組織力量進行“衛攻”

我到新班不久，處分的佈告又出來了，而張致祥秘書找我談話，問我對這次處分有何感想和認識，同意不同意？這真是“雨後送傘”。當我向同學說解一些我對系領導工作的意見時，領導對這事，到是相當敏銳的，找我去談話，說：你這樣做，會破壞系的威信，以後不許你亂講。越來越無法無天，同學們連說話的權力都沒有了，不知系領導怎樣理解憲法上的規定，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而在鋼院黨紀團法何在？

有意模糊同學對我的認識，進行虛偽的宣傳。興緻所至，把你扭去這個訓你一頓，那個就扣帽子，稍有反駁，就叫你离校，並口口聲聲的講：隨時都有開除你的可能。請問誰給了你這樣的權利？

十六、新的不幸

頭些天，魏院長、張致祥、還有某某在院長辦公室，召我去談話。警告我，再不老老实實學習，就請我走。當時我要求把幾年來的事情，徹底調查，分清是非。有錯誤就得承認錯誤，不能把錯誤完全壓在一個人的頭上，別人却逍遙法外，安然自得。

領導當場即這樣講：你還是安心學習，鳴出來對你沒什麼好處。“我們一點錯沒有”言外之意叫我抱著不了了之的態度。我抗議這種阻礙整風，別有用心，帶有威脅口吻的話。

六月四日下午，和同學一起到教室樓210去考查制圖(就是讀圖)。上課鈴響了，圖也發下來了。趙秘書(是制圖課的講師)交待了注意事項之後，就在前面和我們的輔導老師(不想說出他的名字，此事與他無關係，只是傳達(下轉第四版)

談“照顧”

新 鋼

“照顧”一詞，人們聽到它，會感到溫暖；人們遇到它，會表示由衷的感激。確實是這樣，“照顧”本身就存在着這樣一種感染力。許多人為什麼要照顧，原來他們在生活上有着某些困難，需要解決。如經濟上有困難者，希望得到照顧；夫婦不在一起的，也希望在一起，以渡共同的生活和撫育自己的子女，也就希望照顧；……這些合理的要求，應該值得考慮和照顧的。

“照顧”在我院

在我們學校里，是怎樣呢？“照顧”在許多方面都失掉了它原有的涵義。不當照顧的，偏要照顧；而確實需要照顧的，却漠不關心。福利金原是用來為大家的利益服務的，是補助一些生活困難的同志們用的，但竟有人把它當作人情奉送給副院長，企圖以此取寵，難道副院長的生活很困難嗎？而有些真正困難的同志，向人事科提出申請，儘管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難得如願。“特別班”在我院設定，這些學員，都是老干部，都是黨員。根據現在所揭發的事實來看，雖不全面，但有很多事實令人感到異常遺憾的。他們為什麼可以帶眷屬來校學習，他們為什麼要自己審定教學計劃？因為他們是老干部，就給他們這樣的特權嗎？而“吃苦在先，享樂在後”又怎樣解釋呢？有些同志對愛人與自己不在一起工作，一再提出申請，要求把愛人調來，但人事科對這些人的申請，不是置若罔聞，就是強調困難，一拖再拖。試問：領導干部的愛人，有幾個沒有調來？人事科工作人員的愛人，有幾個沒有調來？許多黨員干部的愛人，又有幾個沒有調來？人事科為什麼能給他們很好地處理這些問題，而且在處理過程中，也不受有着“精簡人力與人事凍結”的限制？但對一般人來說，人事科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及態度上，又是怎樣呢？解答是：對領導干部拍馬奉迎，對黨員干部宗派成性，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

“精簡人力”與“照顧愛人關係”是兩件不同性質的事情，不能混為一談

照顧愛人的關係問題，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勿容爭辯的，國務院也曾有過關於這方面的指示。1956年為了貫徹這一指示，許多愛人關係的照顧問題，得到解決。同時也批判了某些機關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現在呢？人事科又回到了56年前官僚主義的寶座。好像群眾要求照顧愛人關係，只是1956年需要。人們不禁要問：1956年是不是法定照顧愛人？人事科的同志說：“今年精簡人力，照顧愛人關係問題難於處理。”事實上，對一般群眾和享有特權的人又截然有兩種不同的作法。我們不否認精簡人力的作用，我們完全承認精簡人力的重大意義。但必需指出：精簡人力與照顧愛人關係在性質上與意義上是不同的兩件事情，不能混為一談。不能宗派式地、教條式地運用這一措施。更不能拿“精簡人力”來作為不處理照顧愛人關係的借口。何況精簡人力還不是個突擊性的措施，更不能說精簡人力的高潮過了以後，就可以浪費人力。愛人關係問題，是必然要照顧的，早遲是要照顧的，何不及早處理，為何給人們拖了又拖？

究竟什麼是“照顧”

在這裡，我想給“照顧”下一個定義：對於群眾提出的合理要求，經過行政考慮、研究，而能給予滿足者，謂之“照顧”。如果這個定義適當的話，那麼“照顧”對執行者來說，本身就意味着，需要通過執行者的思維活動，或者需要克服暫時的困難才能滿足要求者的合理要求。因此，如果認為這樣有“困難”，那就有“阻礙”，開口說要“等機會”，閉口說要看“情況”，不對實際情況和政策進行仔細的分析和研究，即拒群眾之要求於千里之外，這是一種極不關心人的作法，在新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

“機會”與“情況”是由人來掌握？

還是讓它們來掌握人？

所謂照顧要等“機會”“看情況”，這不過只是官僚主義的手法，到底“機會”與“情

況”是由人來掌握還是讓“機會”與“情況”來掌握人？

如果一定要說“等機會”或“看情況”，那麼要求照顧者，能否得到照顧，就完全要靠他們自己的命運了。即使“機會”來了，“情況”好轉了，那也只能說是上帝保佑了他們，上帝照顧了他們。而不能說是人事科照顧了他們。應當肯定說，“機會”與“情況”是不會自己找上門去。人應該掌握事物，因為人是主動的，人有着主觀能动性，這是人的本質。

照顧的原則在那裡？

“照顧”有它的定義，也應有它的原則，我院總務長王慕林的親屬能隨時安插到我院工作，而有些辛勤勞動的工友同志要求轉正則不行；某領導人的愛人能在人事凍結期間調來鋼院工作，齊宗跃、徐家克等同志的愛人，早就要求調來，則至今不行。福利補助金可以奉送給院首長，而對一般的真正困難者的請求則不甚其煩。住房子問題，李鉄夫就可任意挑選房間，搬家四次；力學教研組揚季偉同志身患肺病，想把母親接來照顧自己，請求分配一間房子則不行。由此看來，所謂“照顧”，無非是某些特權人物特殊享受吧了，對一般人來說，“照顧”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的詞兒。

我們完全同意對領導干部做適當照顧，但不能因此而忽視對群眾的關心和照顧，我們反對不合理的“照顧”，過份的“照顧”，拍馬式的“照顧”。

人人都應有作“人”的平等

由於“主宗官”的橫行，奪去了多少人的生活鬥志，傷害了多少人的感情，使一些同志由積極變為消極。劉景芳先生說，“主宗官”是我們的“祖宗”和“官”，確實是這樣，一些寒心的事實，不得不使人有這樣的感覺。就“照顧”而言，它在不同人的身上，也體現出不同的涵義。對黨員領導干部來說，它意味着“特權”與“享受”；對執行照顧者來說，它是“宗派”與“拍馬”的化身；對一般群眾來說，它是由溫暖和感激變成了“欺騙”、“冷淡”和“失望”。“主宗官”的危言，僅在照顧的方式上，已够體現了。在其他的許多問題上，它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搗毀了黨群關係。由它引起的這些惡果，思想起來，真使人感傷萬端。

整風的到來，我們拍手歡迎，希望通過整風，能把人當作人來看待，應該照顧者，必需照顧，能解決的問題應馬上解決，邊整邊改，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大家手攜手，心連心，並肩向社會主義大道邁進。

最後在談照顧的末了，還得談上一件最重要的，必須照顧的“照顧”，就是對我院目前的整風運動，希望院行政和黨委多多加強領導，照顧到它蓬勃，健康地發展和徹底勝利。

放爆竹

“鳴放”有感

物61.2 高佩鈺

“鳴”“放”之初我本欲沉默，至今無法矣！青年人之正義感催我必須“鳴”。雖我年幼無知，但僅我所知，略述對本院“鳴”“放”之感。

本院“鳴”“放”已久，但其效果似乎有些放爆竹之味，除了一响之後留下一股火藥味和偶而落下几片碎紙外，別無它物。本院之整風辦公室確實處置了一些事情，但是當事人的沉默却有大使人過慮之處，好像頑皮孩子鬧事後只讓家長賠償、道歉，能否使這孩子以後不鬧事呢？大有疑問，這種顧慮在某些事實中早已露頭。某些受屈教授一言不發及受屈者不敢起訴，……諸如此類只要回顧四周即可明白，無非是懼當事人之今後行動，今後他會否“反攻”未有保證之際，作為當事人之下司者，有顧慮也是必然，何況他們有家眷者更是如此。

為此，我提請黨委會注意：當事人必須當眾宣佈，且書面於院刊表示自己態度，以資保證今後永不“反攻”（必須有書面，唯恐其口是心非），只有這樣才能消除顧慮，暢所欲言，傾吐心扉，才能有助於黨的整風，否則將遭致“三月桃花一時紅，風吹雨打一場空”之景。

來函照登

編輯同志：

6月7日71期院刊有關「6月4日教授座談會爭辯剪記」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失掉了當時發言的精神，現在提出以下幾點：

首先方正知同志在發言之始，就強調地說：“這幾天來有些朋友關心我在教授座談會上沒有發言，今天我來談談……”，這不免令人懷疑他當時的發言是主動的呢還是被動的呢？所以在談話里雖然扯得很遠，往往欲言又止，不能暢所欲言。

其次劉景芳同志表示不同意見以後，方正知解釋地說：“……魏院長拿一百塊錢的問題比較他的錯誤是小的……”，方正知同志是上一屆工會基委會主席，很早就靠攏黨接近領導，既然說拿一百塊錢問題是比較小的，那麼為什麼不談一些大的呢？

我當時主要是針對這兩點對方正知同志提出批評，同時為了說明領導作風上的問題，是小事呢？還是大事呢？也談了有關魏院長傳教務長的幾件小事（姑且這樣說罷！），也同樣被精簡掉了，象報道那樣孤零零的，我的發言反成贅瘤了！

建議校刊對發言要登就全部登出，否則干脆不登，剪記是要不得的！

盧與階啓 6.8

(上接第三版)

了趙彥樞的指示，因為趙是它的頂點上司，不得已而為之）不知說了些什麼？不一會，輔導老師過來了，問我這張圖你讀過了沒有？我答讀過。他說同學對你有意見，你別考查了，以後我們單獨找時間，或參加別的班的考試。顯然這是趙的獨出心裁，另有打算，用心是狠毒的。

這裡應說明一下，在去年補考制圖的時候，趙是直接參與的（而當時並不是教制圖）來評定成績。所以補考時，讀的圖趙早就知道的，而且過去因制圖留級，現在都是隨原班參加考查的，鋼院從來沒有這樣一條制度呀！因過去學過制圖，就不能和大家一起參加考查了，這是趙彥樞的制度，獨斷獨行，創造性的發揮，借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同學對你這次考查，都有意見……這完全是欺騙、鬼話，事後我問同學，大家根本不知道。當場他把圖拿走，做出無理不允許學生參加考查的惡劣行為。

現在變相的報復打擊，已降臨到我身上。希望院領導注意，實現“諾言”：對打擊報復者要嚴加制裁，我要求處理。

十七、“三害”辦公室

劉主任身為黨員，但卻有意地不讓大家鳴放說：“三、四年級同學是胡鬧，叫大家不要隨便跟着他們走，不要相信大字報上的話”這就是對“整風”的抵觸情緒的流露，有意的挑撥離間。同學們！打倒這個攔路虎，連高爐平爐都分不清的冒牌系主任。

趙彥樞秘書不言之喻，每個同學都知道，完全虛偽，拍馬奉承，欺上壓下，在系里一手遮天，造成許多人圍攻他。

“女班長政策”的趙彥樞，和趙有特殊親密關係的女班長竇連宏（機3.2），張手就撕去我揭發趙的大字報，被同學發現了，拒不承認錯誤，反而裝腔作勢的，哭哭啼啼的，逼着班上的支書，叫發現他撕大字報的那位同學向他道歉，真是無恥！引起同學的公憤後，並假借全機三班女班長的名義出大字報，對趙進行包庇，不僅如此，在系辦公室趙和竇大吵大鬧，這大概與盡人皆知的，“女班長政策”有關吧！

我建議大家組成小組，對“女班長政策”進行調查研究，它能幫助我們更清楚認識趙彥樞的本質。因為問題的本身，就說明了趙的道德品質如何？值得懷疑！

抗議竇連宏撕毀大字報，打倒攔路虎！

同學們！這些人能搞好機械系嗎？很值得懷疑。不稱職的人，就應當撤換，這是理所當然的，否則機械系還會一團糟，象過去那樣烏煙瘴氣的，所以我要求市委公正地處理，以保證大家的学习，讓我們一起行動起來，為機械系的命運呼呀！

十八、我的要求和建議

建議：徹底清查機械系幾年來的工作，特別是系秘書的工作。由公正人組成調查小組，全面的進行檢查，及時的處理。

我的要求：當眾恢復個人名譽，迅速解決學習問題，得到適當的安排。